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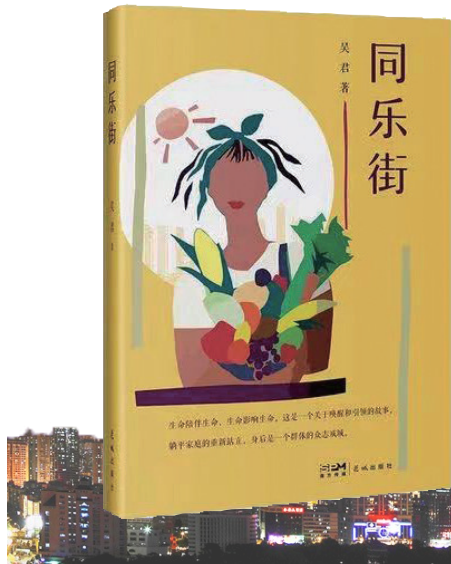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吴君长篇小说《同乐街》： 两种文学传统的交融

□陈培浩

长篇小说《同乐街》(花城出版社2022年9月版)(原发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原名《晒米人家》),是吴君近年重要的创作成果。原作31万字,《人民文学》节选发表其精华部分。小说以改革开放前沿海深圳的同乐街为背景,描写了这个保留着独特的集体股份制合作生产模式的村落中,落后户陈有光与“90后”社区干部钟欣欣之间的摩擦、冲突及和解,既展示了在共同体观念感染下人民内部的碰撞和融合,又呈现了一代新人融入土地和人民的过程。《人民文学》在微信推文的导读中强调了作者将细节作为叙事推动力和“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如果把《同乐街》放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源头或可追溯柳青的《创业史》。钟欣欣对位的是梁生宝,陈有光对位的则是郭振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哺育下成长的吴君,自觉地回到“十七年文学”中寻找写作资源,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可能还隐藏着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再出发、文学人民性再体认的议题。

一般而言,1949年以来的文学被归入当代文学,但当代文学内部却存在着“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既存在差异又彼此纠缠的文学传统。人民文学传统也即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或狭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而人的文学传统则涵盖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个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可谓各领风骚几十年。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同构,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但个体的过度释放却在进入21世纪之后走向其反面。90年代末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重新成为热潮,但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召唤出相同类型的写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代作家的写作依然是沿着80年代“人的文学”的延长线前进。“文学是人学”的议题曾在80年代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共振,“人学”的文学遗产包括:反对不切实际的高大全人物,回归人物的日常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价值上的人道主义和文学技巧上的现代主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说这些主张已经失去了有效性。80年代以来,个体美学曾崛起于当代文学内部并成为风头甚劲的潮流。个体美学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回声,强调“自由存在于孤独的可能性中”(佩索阿),强调艺术将人“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布罗茨基),强调艺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现代主义的个体美学呼应于80年代的启蒙主义,重塑了彼时中国文学对个体尊严的想象,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美学有效性。但是,个体



美学在进入9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极端,陷于个人主义的深渊。很多写作者疏离于时代和社会,沉溺于一己之情绪、经验和趣味,将自我的孤独花园绝对化为世界和宇宙,更有甚者一面从消费主义社会中精心获利,一面则“倚小卖小”,将“小”视作时代的本然和应然。这种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个体意识和美学倾向遭遇了与时代社会血肉相连的美学趣味的反叛。留心于当代文学者不难发现,近十年来,一种新的审美转型正在发生,这就是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美学转型。由此,共同体的美学的崛起可谓应运而生。我们必须在这种审美转型中理解吴君《同乐街》的选择。

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拥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两结合、三突出,比如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对于历史本质的执着。对于人类生活之集体性、理想性和乌托邦性的追求是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重要特征,但“十七年文学”并非没有留下教训。因此,今天,社会主义文学再出发,必须面对的不是一个传统的激活,而是多个传统的兼容。换言之,必须面对的是站在人民文学传统,如何吸纳“人的文学”传统;站在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立场,如何将古典的、外国的文学资源也兼容并蓄。吴君《同乐街》从写作到作品题材、价值取向,都体现了重新激活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选择。今天,当代文学写作重新激活“十七年文学”经验,并非重回一种单向的集体美学,而是导向一种沟通个

文学的人民性具有某种理想性和精神潜能,只有写出洋溢在土地深处和人民身上那种明亮的欢乐,新人的理想和历史的视野才更有力量,共同体美学才真正有效。但是,人民又不能因为总体性和理想性而失去具体性。毋宁说,看到人的具体性是“人的文学”的要求,看到人的总体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则是“人民文学”的律令。

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民族与世界的共同体美学。所谓共同体美学,即不是用个体去否定其他个体或集体,也不是用集体否定个体,而是寻求并存与共生的美学。不将某个人物(不管是钟欣欣还是陈有光)的立场绝对化,也不屏蔽或过滤多样的声音。八九十年代文学发现了“个人”,“个人”浮出历史的地表体现了彼时的时代和文化迫切性,这个“个人”如何既葆有自身经验,又走向对公共世界的关怀,这正是钟欣欣这个“90后”社区干部的时代性和典型性。

吴君要处理的,不但是把生活的细节和文学的肌理带入大时代的典型场景,将个体细小的美学和集体宏大的历史视野结合,还是将理想化的新人与在场的人民联结起来的问题。或者说,如何深化理解文学人民性的问题。人民是一个总体性范畴,人民超越于某一个,但又不放弃任何一个。文学的人民性具有某种理想性和精神潜能,只有写出洋溢在土地深处和人民身上那种明亮的欢乐,新人的理想和历史的视野才更有力量,共同体美学才真正有效。但是,人民又不能因为总体性和理想性而失去具体性。毋宁说,看到人的具体性是“人的文学”的要求,看到人的总体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则是“人民文学”的律令。这个时代的文学召唤,吴君感受到了,“同乐”不是独乐,但同乐也不是对个体之乐之否定。《同乐街》正在两种文学传统的交融之路上出发。

(上接第2版)要实现这一文学理想,需要一大批能够承担使命的文学新人涌现,需要更多的“陌生人”来打破藩篱,带来新鲜充沛的文学能量。我们要警惕文学在作品发表、评论聚拢、名誉颂扬等方面的固化和僵化,以开放、包容、鼓励的态度和务实有效的举措,多方面发现人才,增强文学队伍活力。为此,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的资源,都要朝向这个目标努力。

要推动鲁迅文学院在文学新人发现和培养方面丰富班次、扩大覆盖,优化机制、提升质量。筹办多轮次、多层次的作家培训班,力争覆盖青年作家、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网络作家、新锐作家、网站编辑以及编剧等其他文化行业从业人员,扩大文学人才的发现与选拔范围。优化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教学体制,与当前人才培养的迫切任务相衔接。要做好2023年会员发展工作,不断壮大各级作协会员队伍,优化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增强会员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常态化联系会员制度。各报刊社网要加大青年作者的关注与扶持,为文学新人的成长提供更多机会。深入做好新的文学群体和文学组织调研工作,摸清现状、发现问题、明确工作方向,将打造文学新力量、加强统战工作规划和网络文学发展规划等工作统筹考虑、同时推进。

(六)发挥组织优势,扩大工作覆盖,提升文学活动的质量和效能
联合更多社会力量,争取更多社会资源,不断拓展文学工作新空间。继续推动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基地建设,对已经挂牌的实践点要加强指导和管理,坚决杜绝“一挂之之”。要指导实践点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活动,发挥示范效应。继续开展“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教育、“中国一日——中国作家在行动”、“文化润疆”等文学活动,推动广大作家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动实践。着力加强中长期重点选题规划,聚焦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组织主题创作、开展主题活动。广泛开展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公共文学服务。开展“文学之乡”创建活动,多方面动员社会资源参与“育才图书室”工程。举办“文学周”“名刊名编走基层”“文学公开课”等群众性文学活动,加强文学志愿服务组织化建设,不断扩大优质公共文学服务向基层、向文学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倾斜。促进全国文学馆之间的交流合作和资源互补,进一步提升文学博物馆、名家故居的公益服务水平。

(七)增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权威性

推动对外文学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走出去”“请进来”,更需要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机制,以具有国际认可度的文学荣誉,吸引国外作家作品、出版社和读者主动走过来,主动把目光聚焦过来。这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我们将加强与相关单位部门的沟通协调,精心谋划、稳妥推进,使中国文学能够在更大、更自主的平台上与世界文学自信对话。继续做好基础性的交流交往工作,推进“一带一路”文学联盟机制建设,开展“一带一路”青年写作计划,积极推进南京“国际文学交流中心”、南宁“中国—东盟文学交流中心”、成都“中国—南亚文学交流中心”建设,举办汉学发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和翻译家工作坊,不断深化双边、多边论坛机制运行。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对外译介,充分发挥《人民文学》外文版的作用,持续推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工作。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启动中国网络文学“Z世代”国际传播工程,以“网文出海”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各位委员、同志们,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新时代是标刻着历史机遇和光明未来的新坐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又一次伟大远征,我们责任无比重大,我们奋斗的使命无上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续写中国文学新的辉煌!

■新作快评 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收获》2022年5期

生活的偶然与本质

□北乔

小说直面现实,快捷地让现时生活转化为文学叙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沉淀当下的生活,拂去浮尘,探索某些本质性的内在,继而让书写既与正在进行的生活互动,又能在书写上具有文学性的价值,对作家对文学都是一个考验和呼唤。

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虽题目中有“古代”,却是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小说,并积极写现实性的品相。主人公的经历,我们或许没有,但与他相似的困厄和苏醒,以及由此展开的纠结或挣扎,我们似乎都有过体验。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林成木因处于居家隔离,失去了往常与外界密切互动的便利,继而心力内收,关注家庭生活,发现了妻子的优点,意欲与情人李格格断绝关系。然而一有机会,他又与李格格恢复联系,并外出见面。在得知同事有感染可能时,林成木感觉到事情要败露,慌乱不已。小说最后,危险解除,留下了许多的意犹未尽。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影响,而“隔离”这一物理状态,既紧缩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又对心灵、情感和精神产生了压迫感。赵宏兴将“困境”从表象中抽出,在另一角度形成叙述张力和隐喻之下的人性状态。小说中林成木的内省,并非自我的觉醒,只是外力作用下的无奈之举。无法与李格格见面,甚至隔空联系,那个世界之于他是空白的、无效的;而居于家中,妻子的贤惠、儿子的可爱,让他有了温馨和踏实之感。曾经的虚空,此刻充实了。

这篇小说的情节推动来自于“困境”的变化,基本上属于线性结构,这其实是隐喻环境之于人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是改变抑或叛逆,只不过是瞬间抹去了些许的尘埃,并未触及麻木的灵魂和浑沌的情感。所谓的反转,当具有真切的生活逻辑,也是社会现象的文学化呈现。我们看到了林成木与现实的博弈,但“困”与“突”的行为背后,有着令人惊讶但又极其平常的意味。当“困”成为主要力量时,处于下风的林成木开始收缩防守,并有所反省。反省的力度,与他本人无关,只取决于“困”的力度。当林成木为了减少对李格格的想念,带着妻儿外出游玩,他感受到家庭的暖意以及由坦荡所带来的幸福感。那一刻,他似乎要下定决心不再与李格格来往,站在山顶,面对原野,他大喊“我会成功的!”这不是向内的决绝,而是向外呼喊,显然,这样的喊叫只是一种发

泄,一旦“困”势减弱,林成木会竭力寻求突围,他所做的是恢复以往的日常,从单纯的节奏坠入混乱的沼泽。

在林成木的生活中,正常化的生活是“非正常化”的,“困”之中的内心和情感才是正常的,是符合道德和家庭伦理的,也是隐伏于他内心的“自我”。如果没有疫情之困,他在家庭与情人之间的生活摆渡依然会继续,疫情打乱了他自认为正常的生活态势,撬开了生活之祸。在非正常状态下回到正常,而在正常状态之下有着太多或隐或显的非正常。这不是反讽,而是基于生活的清晰且不失真的镜像。因为敏锐捕捉到生活之中的非正常的正常,文学力量得以增值。这种与一般后疫情书写大相径庭的行为,令人耳目一新,更拓展了阅读的有效空间。

之于林成木的反常规行为,赵宏兴的书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常规。也因为如此地对“困境”另一角度的审视,给小说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这是后疫情时代文学叙事值得观察的收获。他以极小的开口,切出生活的剖面,一切都是真实的生活细节,画幅小,但质感强烈。如此,他检拾生活的本真,进行生活日常化的文学建构。这是故事走向、作家叙述和生活情节三者之间的逻辑交融,从而有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的生活气质和文学内蕴。

赵宏兴以与生活一样朴素的姿态进行的叙述,着重描写外在的撕裂,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再想一想小说的题目,明明写的是当下,却标为“古代”。赵宏兴的解释是:“百年之后,我们就是古代的人了,那时,是否有人会从中看到我们在疫情中的人生。”显然,作为小说家,将“当下”标为“古代”,他真正的意图当是表达,林成木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时间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无论何时,这般困之挣扎的图景都在。遭遇困境,我们有很多的处理之道,然而终究无法借助外力来实现救赎。就像本要自杀的林成木会重新回到生活中,无论疫情在或不在,他的生活还将继续。“林”成“木”,看似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阻隔,但还可以有另一种指向,就是当一个人从群体中抽身而出,他需要面对生命中的所有。

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小说,但又是一篇与疫情无关,指涉生命恒常的小说。

■短评

《冯玛丽的玫瑰花园》是樊健军近期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大部分是他近几年以县城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创作的篇什。“县城”介于城市和乡镇之间,外有城市的雏形,但内怀乡镇的灵魂。县城的生活总体上缺少选择的可能性,人与人之间相互熟稔,自然也难逃彼此“凝视”。中国现代小说中不乏在城乡之间“出走—归来—出走”的叙事模式,小地方生活在现代眼光的审视下或者被批判或者被赋予诗意。但樊健军从未完全出走,他孜孜不倦地描摹县城密集的“目光”下稍显压抑的生活,书写普通人如何受到这种无形的“目光”灼伤,并试图反抗和逃离。

这些“目光”带着某种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被看的人则往往能感受到这些“目光”的压力,并被其左右。中篇小说《内流河》中胡细楠和蒋文静生下哑巴女儿。小说从始至终没有着笔写流言蜚语,但蒋文静僵硬而亢奋的姿态足以说明她感受到的压力之大。她不甘于现实,试图将女儿培养成一个钢琴演奏家。为此,她不惜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到特殊学校去当教师,并想方设法挖掘和培养女儿的钢琴才能。但遗憾的是女儿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尔后又想通过二胎来弥补这个“过失”,怀孕不成致使她陷入第二重困境。丈夫胡细楠的困境与其说来自女儿的残疾,不如说来自妻子对女儿的“过度用力地栽培”。胡细楠不能参与女儿的教育,甚至无法与妻子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他在家庭中“父亲”的身份和“丈夫”的身份因为妻子的“紧张”被全部架空。县城里庸常的“目光”就这样构成对一个家庭内伤的介入。《镜子的禁忌》中Mr. Wu与妻子十分相爱,即使妻子成为植物人之后,他依然悉心照顾。他对妻子超乎寻常的爱意很快被小城的“目光”所捕捉,进而被塑造成道德模范。可怕的是,“公众称号”让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成为陌生人可以公然进入的场所。这些围观的人看起来是同情,但也暗含着幸灾乐祸的嘲笑;听起来是赞许和恭维,但同时也是怀疑和监督。

樊健军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看客”,而是荡开一笔,讲述这些被目光塑造的个体如何带着绮丽高亢的姿态与压抑的生活搏斗,找到真实的自我。《内流河》中的胡细楠在家庭生活中的“无力感”,让他成为一个悬空的个体。他在家庭之外创办棋校、收藏美丽的荔枝石,邂逅了略带神秘的情人马萧萧。他在这些生活中体现才智、兴趣和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后遗症生活》则是无比耐心地讲述普通人如何不厌其烦地弥合生活的创口,打捞生活的意义。安一城不厌其烦地为患有自闭症的女儿寻找走失的宠物狗,彩虹婆婆终日张贴告示寻找失踪的儿子,易志文则在寻找几十年前给妻子的情书。

应该说,樊健军是悲悯的,也是现实的。这些普通人的“内伤”,通过迂回的自我疗愈,最后还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上。《内流河》中蒋文静在屡受挫败之后露出柔弱而悲伤的样子,胡细楠则在妻子的情感召唤下,既无奈又勇敢地承担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冯玛丽的玫瑰花园》中冯玛丽在母亲留下的日记里找到了“爱和宽恕”的能力。《镜子的禁忌》中,Mr. Wu长期生活在植物人的“模范丈夫”话语的包裹之中,他选择在镜中呈现自己真实的欲望,来抗议围观者的道德绑架。但另一方面,他却在追述自己与妻子的过往再次确认自己的情感和责任。应该说,樊健军所说的“被看”的困境,不仅是县城里普通人的生活症候,也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问题。他的叙述既有对生活独特的观察,也有对反抗途径深入的思考。他试图揭开暧昧的生活表象,用一种内敛又上扬的方式,讲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与精神疗愈。

由我走向我们的写作

□吴君

■创作谈

新的岭南已经历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经历了山乡巨变的四十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四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广东的精神面貌、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记忆中的岭南、舌尖上的岭南、旧书旧电影里的岭南,而是换了汤也换了药的岭南,是日新月异、舌尖上的岭南、旧书旧电影里的岭南,而是换了汤也换了药的岭南,是日新月异、舌尖上的岭南、旧书旧电影里的岭南,而是换了汤也换了药的岭南,是日新月异的岭南,是山乡巨变、科技创新、领风气之先的岭南,是新故事新人层出不穷的岭南。

经历了大时代变迁的广东作家,内心的裂变、驳杂、纷繁、曲折和多维必将影响作家的创作轨迹。四十余年的中国文学版图需要广东作家提供出新的文学形象和新的表达。广东的四十余年,毋庸置疑被镶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这一块胶着了各式话题,关注度极高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国人的神经,文学和影视作品有着先天的优势和关注度。广东作家生涯创作和发展的盛世,如何书写这片火热的土地,对每位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考验。纵观广东文学史上的多部优秀作品,得到关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无一不是由小我走向我们,无一不是与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题材。

2017年到2022年,我先后写出了反映深港两地一家亲的长篇小说《万福》和原驻民在基层干部的帮助下从“躺平”到站立的长篇小说《同乐街》。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主题创作并非易事,除了不能任性、凭空编造,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存在问题。我一边学习各种史料,掌握各领域的知识,了解相关政策,不断发现自身的盲区,打通各种壁垒,了解当下社会变革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同时,又不能被材料束缚手脚而限制了想象,被眼前图景遮蔽,而失去了作家独立的判断。在创作《万福》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香港与深圳这一对血肉相连的双城,从古至今,缔结他们的绝不只是物质上的供给互助,还有更为具体而真实的情感依偎和守望。屯门到万福是回归之路,也是幸福之路。“万福”这个小说名字,正是全国人民在疫情期间的良好祝愿。《同乐街》带给我思考的是面对新的时代,富裕后的同乐人,如何吃下这个天大的馅饼,消化这天外飞来的财富,仅凭一己之力如何抵挡来自生活暗处的洪峰。今天的当家人们在股份合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能否担起昔日生产队员、今天新居民的全程厚望。城市化进程的路上是否还需要集体?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集体,多少个掉队的陈有光们会沦陷,多少个迷失的陈德福会一蹶不振。互助、合作、股份合作是深圳原住民留下的退路,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顺应时代变化,推动合作社经营模式转型升级,只有这样,新型的合作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广阔。

「县城生活」的另一种讲述

——评樊健军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 □俞佩淋